

人文中國學報

SINO-HUMANITAS

第十三期



香港浸會大學

人文中國學報編輯委員會

上海古籍出版社

人文中國學報

桑園題


第十三期

● 香港浸會大學 ●

人文中國學報編輯委員會

(本刊稿件全部經過隱名評審)

上海古籍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人文中國學報. 第13期 / 香港浸會大學《人文中國學報》編輯委員會編.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7. 9

ISBN 978 - 7 - 5325 - 4778 - 4

I. 人... II. 香... III. 社會科學—文集 IV. C53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7)第 104815 號

《人文中國學報》第十三期

香港浸會大學《人文中國學報》編輯委員會編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發行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郵政編碼 200020)

(1) 網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1@guji.com.cn

(3) 易文網網址: www.ewen.cc

長華書店 上海發行所發行經銷 上海展強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開本 889 × 1194 1/32 印張 16.875 字數 419,000

2007 年 9 月第 1 版 200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 — 1,100

ISBN 978 - 7 - 5325 - 4778 - 4

I·1964 定價: 58.00 元

如有質量問題,請與承印公司聯繫

《人文中國學報》編輯委員會
(姓氏筆畫爲序)

文潔華

香港浸會大學人文學課程/宗哲系

朱益宜

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

宗靜航(執行編輯)

香港浸會大學中文系

林啓彥

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

周國正

香港浸會大學中文系

吳有能

香港浸會大學宗哲系

黃國彬

香港中文大學翻譯系

梁元生

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

張宏生(主編)

香港浸會大學中文系

馮耀明

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

單周堯

香港大學中文系

葛曉音(主編)

香港浸會大學中文系

鄭健行

香港浸會大學中文系

《人文中國學報》顧問委員會 (Advisory Board)

(姓氏筆畫爲序)

安樂哲 (Roger T. Ames)

University of Hawaii

吳宏一

香港城市大學

吳清輝

香港浸會大學

余英時 (Ying - Shih Yu)

University of Princeton

李歐梵 (Leo Ou - fan Lee)

Harvard University

周策縱 (Tse - Tsung Chow)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 Madison

韋政通

臺灣文化大學

徐中約 (Immanuel C. Y. Hsu)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孫國棟

前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主任

陳永明

香港浸會大學中文系

張玉法

臺灣中研院

傅佩榮

臺灣大學

趙令揚

香港大學

劉述先

香港中文大學

劉殿爵(D. C. Lau)

香港中文大學

謝志偉

澳門大學

顏清湟(Ching - hwang Yen)

University of Adelaide

目 錄

論文

- 朱元璋的文章觀與洪武朝的文學思想導向 羅宗強 1
Zhu Yuanzhang's Views on Literature and the Direction of Literary
Thought in the Hongwu Reign - Period Luo Zongqiang 33
- 論清代蘇軾研究的幾個特點 莫礪鋒 35
Sever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u Shi Study
in Qing Dynasty Mo Lifeng 53
- “著書多格言”
——論高一志《譬學》及其與中西修辭學傳統的關係 李爽學 55
Proverbial Sayings and Late Ming Jesuit Writings:
Alfonso Vagnoni's *Pixue* in the Context of Sino -
Western Literary Exchanges Sher - shiueh Li 115
- 《說文》“變、慕也”辨 周國正 117
On the *Shuo Wen* Glossary
“*luan, mu ye*”(變,慕也) Chow Kwok - ching 124
- 清代東南書院與文士之風氣 徐雁平 125
The Academies in the Southeast China and the
Atmosphere of the Literati during Qing Dynasty Xu Yanping 172

華麗緣中的愛玲女神

——《撲克紳士》、《半生緣》和進念舞臺改編探論 何杏楓 175

Goddess Eileen in Vanity Fair;

An Investigation of H. M. Pulham Esquire *Half a Lifetime Love*

and Zuni Icosahedron's *Eighteen Springs*

Hoyan Hang Fung, Carole 212

淺議桐城文派的韓、柳古文比較論

許子濱 215

A Critical Analysis of Tong - cheng Literary School's Comments on

the Prose Writings of Han Yu and Liu Zong - yuan Hsu Tzu - pin 265

溫庭筠《菩薩蠻》“小山重疊金明滅”句辨疑

陳國明 267

A Critical Analysis of Various Schools of Comments Related

to Wen Ting - yun's "Pusaman Ci Poem" Chan Kwok Ming 315

身處時代交替裏

——北京大學第一任校長嚴復 甘穎軒 317

In the Changing Era: Yan Fu as the First Chancellor of

National Peking University Michael, Wing - hin Kam 335

唐代守選之制與干謁之風

王 佺 337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houxuan* and *Ganye*

in Tang Dynasty Wang Quan 368

“誰似儂家疏曠”

——孫光憲風物詞析論 孫賽珠 371

Description of endemic customs in Sun Guangxian's *Ci*

Suen Choi Chu Shirley 406

天崩地解與儒佛之爭

- 明清之際逃禪遺民價值系統的衝突與融合 廖肇亨 409
 The Collapsed World and the Battle over Buddhism and Confucianism:
 the Conflict and Confluence of Buddhist Loyalty's Value System
 in the Transition between Ming and Qing Liao Chao – Heng 455

孟軻之辯的政治哲學背景

- 李 巍 457
 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Background of
 Mencius' Debating Ideology Li Wei 476

作為《周易》邏輯基點的“人是生命”命題

- 吳述霏 477
 The Proposition “Man is Life” as the
 Logical Base Point of *The Book of Changes* Wu Shu – fei 497

書評

《中國晚明與歐洲文學——明末耶穌會古典型證道故事詮》

林質心 501

《有志竟成——孫中山、辛亥革命與近代中國》上、下冊

文兆堅 黃耀忠 509

《陳振孫評傳》

李 丹 517

《古史異觀》

朱淵清 523

朱元璋的文章觀與洪武朝的 文學思想導向

羅宗強

提 要

朱元璋實行思想統制，此一思想環境，影響着洪武朝文學思想之發展。他對士人既親近又猜疑、濫殺的行為，造成士人複雜之心態，他為士人留出的生存空間，對文學思想的走向，也起著導引的作用。

朱元璋前後七次詔諭文風改革；他對詩文和戲劇內容的限制，著眼點全在治道的得失上。他的文章觀的核心是尊典謨、重實用、去華飾、求平實，輕視藝術表現。

由於文化環境的影響和朱元璋的文章觀的導引，入仕新朝的一部分士人文學觀念的變化十分明顯。他們的創作傾向與文學觀念，適應其時之政治環境，逐漸成為洪武朝文學思想之主流。首先是詩歌創作中出現了頌美的傾向，追求一種雍容典雅的氣象。同時以宋濂為代表的原道、宗經、復古的文學思想，與朱元璋的治國理念、文章觀相符，處於其時文壇之正統地位。

重個人情懷自由抒發，無關政教得失的文學思想觀念，和承繼元末擬古傾向的文學思想，則處於在野的地位。

關鍵詞：朱元璋 治道 士人心態 文風 文學思想

洪武朝之文學思想傾向,對有明一代之文學思想走向,有深刻之影響。而朱元璋建立明王朝之初所營造的文化環境、他給士人留出的生存空間、和他的文章觀念,對洪武朝文學思想主流之形成,有著十分重要的作用。

一

朱元璋實行思想統制,明王朝建立之初,便制禮作樂,嚴格等級關係。治道崇儒術而兼取佛、道。他著《三教論》,從實用角度論三教。他所說三教,指儒、釋、仙,稱老子不應列入三教之內。他注《道德經》,對老子的思想給了很高評價。他之推崇老子思想,主要是用其君人南面之術。他崇儒,反復推崇孔子。他之推崇孔子,是用其思想以為王綱之準則;他用仙、佛則用其制約人心,使人有所敬畏^[1]。他一再提到《大學》的重要。洪武五年,他對禮部侍郎曾魯說:“《大學》平治天下之本,豈可舍此而他求哉?”^[2]洪武十七年四月他又對侍臣說:“朕觀《大學衍義》一書,有益於治道者多矣。每披閱,便有警醒。故令儒臣與太子諸王講說。”^[3]真德秀在《大學衍義》中闡釋四大綱,特別重視治心。朱元璋看中的主要是這一點。洪武十八年,他對朱善說:“人心道心,有倚伏之機。蓋仁愛之心生,則伎害之心息;正直之心存,則邪詖之心消;羞惡之心形,則貪鄙之心絕;忠愍之心萌,則巧僞之心伏。故人常持此心,不為情欲所蔽,則至公無私,自無物我之累耳。”^[4]治心是治己,亦治人,而且更重要的是治人。洪武一朝,對人心的管制是空前的。他看中《大學》的另一點,是看中其中的執中之道。他對執中的理解,是指張弛并用。這從他的行事中可以得到充分的證明。他施政,有時嚴刑峻法,有時又寬容舒緩,都不過是無過不及之本義。

他崇儒完全是從他的治道出發的。儒家思想若有礙於他強化政權,他絕對不容許。這從一事可以得到說明。洪武五年,

他曾命罷祀孟子，因廷臣之諫諍而復祀。雖復祀，而他對孟子的反感并未消失。洪武二十七年，他命劉三吾刪節《孟子》中對他維護絕對之君權有礙的部分內容，成《孟子節文》一書^[5]。據劉三吾《孟子節文序》，編寫目的非常明確，就是要刪除那些有礙君權的言說，序稱：

又引文王靈臺之事，《湯誓》時日害喪之喻，豈不太甚哉！雪宮之樂，謂賢者有此樂，宜矣；謂人不得即有非議其上之心，又豈不太甚哉！其他或將朝而聞命中止，或相待如草芥，而見報施以仇讎；或以諫太過，不聽以易位；或以諸侯危社稷，則變置其君；或所就三，所去三，而不輕去就于時君。故其崇高節、抗浮雲之素志，抑斯類也，在當時列國諸侯可也。若夫天下一君，四海一國，人人同一尊君親上之心，學者或不得其扶持名教之本意，於所不當言不當施者，概以言焉，概以施焉，則學非所學，用非所用矣。

根據此一編寫原則，《節文》刪去《孟子》一書中八十五章^[6]，并明言此刪去之八十五章，“課試不以命題，科舉不以取士”。凡有觸犯王權之絕對權威者，均在刪去之列^[7]。容肇祖先生歸納所刪文字為十一個不許說。其實，刪《孟子》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實行思想管制。凡有礙於思想管制的，都在刪去之列。在孟子的思想裏，君臣的關係，是互為前提的。君如果不盡君道，則臣也可不盡臣道。而此一點，在洪武朝，乃是一個極端敏感的問題。洪武十三年胡惟庸謀反案，洪武二十三年太師李善長逆黨案，洪武二十六年藍玉謀反案，君臣關係處於十分尖銳的境地。在此一種之背景下，孟子有礙君權之言論，當然也就不容許存在了。

爲了統制思想，他對佛、道二教進行嚴格管理，嚴禁秘密宗教。禁止僧尼、道士女冠交結官吏，違者棄市。他嚴格學校管理，洪武十五年由禮部頒發學校禁例十二條，其中一條是不許生

員議政。洪武十八、十九、二十先後頒佈《大誥》、《大誥續編》、《大誥三編》、《大誥武臣》，昭示全民，每戶一本，敢有不敬不收者，“遷居化外，永令不歸”。他要全國家藏人誦，以為戒鑒。第一次刻印《大誥》時字多訛錯，他又命中書用大字重刻頒行。戶戶藏，人人讀，學校作為課本，農人掛於牛角，勞作之間隙也讀。他又命各府州縣民每里置塾，聚生徒講授《大誥》，洪武二十四年，“賞民間誦《大誥》子弟十九萬三千四百餘人”^[8]。以皇帝一人之見解，視同法律，人人誦讀，人人遵守，其普及之規模，雖非絕後，亦屬空前。從此一點，亦可看到朱元璋對思想行為之嚴格管制。此一思想環境，對洪武朝文學之發展，實具影響。

影響洪武朝文學思想的，還有朱元璋為士人留出之生存空間。他所製造的這一生存空間，對於文學思想主流的形成，實起一種制約的作用。他對士人，既寬鬆，又嚴酷。他的農民出身與人生經歷，使他在氣質上、感情上與士人存在天然的距離。但是他奪得政權，又亟須士人為其服務。無論是立國之前還是立國之後，那種急切禮聘士人的心情、禮聘次數之多，都是前此的歷朝皇帝所不及的。他既用又猜疑，既寬鬆溫情又殘酷無情。他有時對士人寬鬆，特別是對青年人，他們犯錯甚至犯罪，朱元璋常常給予寬恕，令其改過。洪武二十年，有國子生任陝西知縣，受賄被逮至刑部審問。朱元璋念其年少，原諒了他，讓他改過自新^[9]。也是這一年，常州府宜興縣丞張福生犯法當死，朱元璋特寬恕他，稱：“國子生皆朝廷培養人材，初入仕，有即麗於法者，雖欲改過，不可得。”遂命凡所犯雖死罪，三宥之。福生以國子生，故得宥^[10]。在《大誥三編》中，他列出犯罪之進士、監生三百六十四人，其中三犯四犯而致殺身者三人，二犯而誹謗致殺身者又三人，姑容戴罪在職者三十人，一犯戴罪者三百二十八人。對於這三百六十四人的處置，可從兩方面說明問題：一方面嚴刑峻法，輕罪重判。三百多人中，大量的貪污罪：如田忠，為水災受鈔八十貫，絞罪；陳迪，受糧長鵝酒、泄漏消息，斬罪；魯望，為修

船等事受鈔一百貫，斬罪，等等。但另一方面，這些輕罪受重刑的人，又都沒有執行，而令其戴罪任職，給了改過的機會。對有的臣下，他關懷備至。他無意間發現翰林修撰劉泰家有老母，就下了一道諭旨：“卿母年邁，云無他養，豈不動孝者之情？因是敕卿自意，若欲奉來就養，或棄職往侍，皆從所由勿拘。”^[11]對敦厚長者，他特加尊重；對年少人材，他越級提用。十三年胡惟庸案發之後，他急於徵用儒士。該年五月、六月他徵召儒士多人。十四年正月，又下求賢詔；十五年五月，下《諭天下郡縣敕》，訪求士人，共論治道。九月，吏部以經明行修之士三千七百餘人入見^[12]。十月，朱元璋又越級任用了不少秀才^[13]。

他常常與士人吟詩作賦，以營造一種君臣和諧之氣氛。《實錄》和宋濂文集中就記載著朱元璋曾多次與臣下吟詩作賦。洪武二年六月二十九日，張以寧奉命使安南，朱元璋賦詩送行^[14]。《文憲集·翰苑前集》卷七《應制冬日詩序》稱，洪武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召宋濂、危素、詹同、王禕、魏觀等人列坐左右，朱元璋親“賦詩一章，復繫小序於首，命各以詩進。”洪武六年八月宋濂奉旨與詹同編《日曆》，九月開史館於禁中，十一月十五日朱元璋召宋濂、劉基、詹同燕於乾清宮便閣。詹同被酒回宿處，成詩一首贈為《日曆》繕寫之黃昶。朱元璋知道後也和詩一首。宋濂記此事，說：“其附和侍臣之詩，豈非樂育菁莪，以開萬世太平之基者歟。”^[15]宋濂顯然看到朱元璋的和詩對士人的影響了。洪武八年八月，朱元璋臨秋水而有感，作《秋水賦》，命侍臣同賦。賦成賜宴。宋濂酒醉，朱元璋便命其自述一詩，并為之作《酒歌》二首，同時命朱善也作《醉學士歌》。詩成之後，命朱右書寫贈宋濂，說：“卿藏之以示子孫，非惟見朕寵愛卿，亦可見一時君臣道合，共樂太平之盛也。”^[16]這話語裏所透露的賦詩的目的很明確，是要反映君臣遇合，共樂太平之意。宋濂文集中尚有《恭跋御製詩後》記遣使天寧寺僧祖闡赴日，天界寺禪師宗泐有詩送行，朱元璋和詩一首十八韻^[17]。又有《恭題賜和文學傳

藻紀行詩後》，記朱元璋和傅藻詩四首^[18]。現存《明太祖文集》中，與人和詩、贈詩就有三十三首之多^[19]。

朱元璋對待士人的另一面，是嚴刑峻法。成化間陸容在他的《菽園雜記》中引用曾參予修《永樂大典》的僧惠暕的話說：“洪武間，秀才做官，吃多少辛苦，受多少驚怕，與朝廷出多少心力！到頭來，小有過犯，輕則充軍，重則刑戮，善終者十二三耳。其時士大夫無負國家，國家負天下士大夫多矣。”^[20]談遷說：“上雖親儒生，于單辭只語俱臆摩而懸度之，其後功臣多誅絕，早見端於此矣。”^[21]《大誥三編》“秀才剝指”條，貴溪儒士夏伯啓叔侄二人各截去左手大指，朱元璋就說：“今去指不為朕用，是異其教而非朕所化之民。爾宜梟令，籍沒其家，以絕狂夫愚夫倣效之風。”^[22]李仕魯以精通朱熹學說應詔入京，就因為上疏諫朱元璋不應寵遇僧人，引起朱元璋大怒，“命武士摔搏之，立死階下”^[23]。左都御史楊靖，因替同鄉修改訴怨狀，被朱元璋處死^[24]。左僉都御史嚴德瑁，因病請求還鄉，引發朱元璋大怒，“黥其面，謫戍南丹”^[25]。曾參予修《元史》，為朱元璋撰寫詔令、封冊、歌頌、碑誌的陶凱，因自號耐久道人，朱元璋厭惡他這個號，就借他在接待高麗使者時誤用符驗，把他殺了^[26]。殺魏觀、王彝、高啓；殺張孟兼、蘇伯衡，都取決於其一時之喜怒。即使親近如宋濂，他也并不放心。他不僅暗中派人窺視宋濂的行為，而且宋濂致仕，他還不放心，作詩暗示他不得談論朝政。他寫了《翰林承旨學士宋濂歸休詩》并序，詩稱：“聞卿歸去樂天然，靜軒應當仿老禪。不語久之知道貫，以心詳著覺便還。從前事業功尤著，向後文章跡必傳。千古仲尼名不息，休官終老爾惟全。”^[27]詩含意清楚，要宋濂回家之後什麼事也不要吭聲。宋濂築有斗室名靜軒，朱元璋要他獨守斗室，今後庶幾能保全性命。送行而帶恐嚇。有學者撰文，否定洪武朝存在文字獄。其實，在朱元璋自己撰寫的《大誥三編》中，就明白地記載著“作詩誹謗”的案例，江寧知縣高炳為此而身亡家破。

朱元璋親近士人，用他們，又猜疑、濫殺他們。士人的生存空間是有限的。戰亂之後，士人有了一個安定的生活環境，有了用武之地。這個環境帶給了他們希望，但是也帶給了他們驚恐。他們的內心是複雜的。思想的管制與有限的生存空間，對於洪武朝文學創作與文學思想的走向，無疑起著導引的作用。

一

朱元璋的思想管制，他給士人留出的生存空間，構成了洪武朝文學創作與文學思想發展的環境。而他的文章觀，則直接引導著其時文學思想之走向。他不是文化人，他對於文的看法，完全的從他的治國目的出發。他原本沒有文化，但在征戰奪取政權的過程中，極善於學習^[28]。史稱其對經書、史書，對歷史上的有名戰例，都甚為熟識。他常靈活引用經、史、子書的知識於打仗與治國。在學習的過程中，他也學會寫詩作文^[29]。從他的詩文中，我們可以瞭解他的文章觀念。

朱元璋的文章觀，極簡略說，是尊典謨，重實用；去華飾，求平實。

洪武二年三月，他對翰林學士詹同說：

古人為文章，或以明道德，或以通當世之務。如典謨之言，皆明白易知，無深怪險僻之語。至如諸葛孔明《出師表》，亦何嘗雕刻為文，而誠意溢出，至今使人誦之，自然忠義感激。近世文士，不究道德之本，不達當世之務，立辭雖艱深而意實淺近，即使過於相如、揚雄，何裨實用？自今翰林為文，但取通道理、明世務者，無事浮藻。^[30]

此一段話主要是就章表奏疏等應用文體說的。此一標準，亦用於取士。洪武四年七月，中書奏科舉定制，朱元璋提出了一條非常明確的標準：“科舉初設，凡文字詞理平順者皆預選列，以示